

第一章

第一次世界大戰

1914年7月17日，倫敦市長在市長府邸舉辦年度宴會。就在這個宴會上，財政大臣戴維·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對英國社會的不祥形勢提出了嚴厲的警告。在國內，由礦工、鐵路工人和運輸工人組成的「三方聯盟」正威脅要發動大規模聯合罷工，以支持鐵路工人提出的承認工會和每週工作48小時的要求。在英國面臨全國性工業癱瘓前景的同時，隔海相對的愛爾蘭也到了內戰的邊緣——信奉新教的愛爾蘭北部地區和信奉天主教的南部地區有20多萬人武裝起來，使持續了幾個世紀之久的愛爾蘭民族主義似乎到了用血腥內戰解決的時刻。在國外，印度和埃及出現民族主義糾紛。在離英國不太遠的東南歐，奧地利大公弗朗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6月28日在波斯尼亞的薩拉熱窩遇刺，重新引發了巴爾幹地區的種族紛爭。

在世界大戰爆發前夕，英國似乎面臨着文明世界的自由民主即將解體的危險，而政府及其政策措施又因無力控制緊張局勢而顯得捉襟見肘。然而，正如過去慣常出現的情景，一旦戰爭這個最高危機爆發，這

些衝突因素迅速減弱，成為次要問題。全國上下被一種共同的目標團結起來。英國於8月4日宣戰之後，在敵對狀態下的最初幾周中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恐慌。財政部和英格蘭銀行採取了激進措施才維持了國家的通貨和信用。為了適應戰爭的挑戰，製造業與商業界幾近絕望地努力保持其職業道德規範並宣稱「生意一切照舊」。英國遠征軍早期的實戰經歷幾乎都是災難性的。這是一支匆忙之中拼湊起來開赴佛蘭德斯和法國的隊伍，在伊普爾遭遇嚴重挫敗，不得不從曼斯撤退，損失慘重，潰不成軍。英軍兵力減少到三個軍團，其戰鬥力幾乎從一開始就遭到大幅削弱。只有法國軍隊在馬恩河畔的拼命抵抗才阻止了德軍向巴黎的進軍和德奧聯軍的過早勝利。

雖然如此，在經歷了最初的災難後，英國及其領導人作好了持久戰的準備。重大的國內問題，如愛爾蘭的自治問題，由於戰爭的持續而被擱置起來。所有政黨宣佈了它們之間的無限期和解。1914年夏天的勞資關係紛爭也逐漸平息了；英國工會聯盟所表達的傳統愛國主義熱情甚至蓋過了企業主們。一種奇特的平靜氛圍籠罩着全國，而這種平靜是基於廣泛的——儘管遠遠不是全體的——關於戰爭正義性的共識。要使一個自由社會接受這一點，就需要從某種寬泛的人道主義立場來解釋這場戰爭的真正意義。這一工作是由勞合·喬治來完成的。他本人曾是1899年南非布

爾戰爭的強烈反對者，並且多年以來一直是阿斯奎斯(Asquith)自由黨政府最大膽直言的左翼閣員。在最初的幾周裏，勞合·喬治一直保持着令人疑心的沉默。但1914年9月19日在倫敦女王大廳對一群威爾士同胞發表的雄辯演講中，他毫無保留地承諾要將戰爭進行到底。他站在，或者宣稱站在，最高的道德立場上。他宣稱，這是一場事關自由主義原則的戰爭，是一場代表「弱小國家」而打的聖戰。這些小國包括被德國公然入侵的比利時，或者當時正面臨奧匈帝國威脅的塞爾維亞和黑山。神聖戰爭的說法不僅得到所有基督教教會領袖們的支持，也得到查爾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和格拉德斯通(Gladstone)等所有自由主義英雄們的支持，所以勞合·喬治的立場立即得到全國性的響應也就沒有甚麼奇怪的了，甚至英國國內較小的蘇格蘭和威爾士地區也作出了同樣的回應。

贊成參戰的共識

在接下來的可怕的四年裏，贊成參戰的廣泛共識基本沒有改變。當然，這期間還是有不少的變化，尤其是在1916年5月不受歡迎的徵兵決議開始實行之後。最終，到了1917年，不考慮其他因素，如勞工組織變得愈加激進以及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救世主般的魅力，單是厭戰情緒就已開始動搖這一共識。當然，

這種共識的維繫也是由於政府對新聞媒體進行了軟硬兼施的控制、審查以及編造「德國佬」危言聳聽的暴行。政府對激進派或反戰分子進行了大量迫害。儘管來自政府的壓力很大，到1917年時，基督教和平主義者的「反徵兵組織」和民主監督聯盟(主張媾和)等組織對公眾的思想還是產生了不小的衝擊。蘭斯多恩勳爵(Lord Lansdowne)對和平的呼籲(1917年11月29日)也產生了很大的轟動。儘管如此，現存的戰爭史料表明當時絕大多數人依然認為這場戰爭是正義且必要的，而且不管代價有多大，必須打到德國人完全投降為止。軍隊對志願者進行了大規模且熱情高漲的招募——1914–1916年招募志願軍以充實赴法部隊的做法也確實證明了這種方式在擴充軍隊數目上遠比此後實行的強制招募成功得多。長年的陸上和海上衝突從最初1914年秋西線的對峙，持續到1918年9月同盟國的突破，而大眾對這些都堅忍地挺過來了。

這些可怕年月從心理上和道德上給英國人的記憶和人生觀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它極大地影響了整整一代的文學作品，同時也塑造了一戰結束以後20年間英國人對外來戰爭威脅的反應。西線的戰爭以一種陌生的形式進行着：雙方採取守勢進行久拖不決的深壕戰，而無法採用1870年普法戰爭期間歷經考驗、引人注目的新式機動攻擊戰。法國在這將近四年的時間裏，戰線幾乎沒有推進。雖然英國偶爾也嘗試抓住戰



圖1 1915年秋按照「德比計劃」在薩瑟克市政廳進行的自願報名參軍活動。1915年10月，德比勳爵提出了一個計劃，旨在保留自願服役的制度，要求人們登記以「證明」他們參軍是出於自願。當時公眾自願參軍的熱情很高：1915年10–11月該計劃下的志願者人數就高達23.5萬人。但該計劃被1916年初對所有適齡男性進行強制徵兵的規定所取代。

爭主動權，但總是以巨大傷亡告終，這對於奢侈地享受了百年和平的英國人來說是非常不可思議的。1915年9月英國對盧斯的進攻很快被擊退。更大的挫折是1916年6月英國在索姆河的進攻，第一天就損失了6萬人，而此役的傷亡總數達到了42萬人。最糟糕的戰役是1917年8、9月份的帕森達勒之戰，超過30萬名英國士兵在戰役中傷亡，其中相當一部分葬身於佛蘭德斯大雨滂沱的泥沼中。地面部隊和坦克等作戰機械在這

種毫無機動可言的戰役中根本無法發揮作用。新型戰鬥機也成效甚微。和在其他場合一樣，指揮官與普通士兵之間存在的階級分野阻斷了他們之間的溝通，這對於整個戰役期來說都是致命的。事實上，英國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裏基本上停止了進攻。1918年3月到4月英軍在亞眠防區拼命阻止德軍新一輪的進攻。直到當年8月英軍在總司令道格拉斯·黑格爵士(Sir Douglas Haig)領導下實現了戲劇性突破，戰爭的勝負才初見分曉。與此同時，勞合·喬治和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等人主張繞開西線僵局，轉而在相對邊緣的「東線」作戰，但這種戰略也遭到了接二連三的挫敗。1915年夏對達達尼爾海峽的遠征是一項巨大的軍事失誤，導致了嚴重的損失；一年後對薩洛尼卡的遠征也是如此。尤其是達達尼爾遠征的失敗讓丘吉爾作為理性政治家的聲譽一落千丈，數年後才得以挽回。即使在英國擁有傳統霸權地位的公海地區，1916年6月英德間的日德蘭海戰至多也就打了個平手。英國主力艦隊在指揮不力的交戰中損失了三艘作戰巡洋艦、三艘其他巡洋艦以及八艘驅逐艦。

後來在幾乎所有劇院中，反戰宣傳片描繪了憤怒的民眾對英軍陸海指揮官的猛烈抨擊，指責他們為災難的罪魁禍首。「戰地詩人」們，如在戰場上犧牲的威爾弗雷德·歐文(Wilfred Owen)和艾薩克·羅森堡(Isaac Rosenberg)，以及在戰爭中倖存的西格弗里德·

沙遜(Siegfried Sassoon)和羅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被帕森達勒的血腥場面震驚了。他們強烈呼籲民眾反對戰爭，反對會使一半的年輕人失去生命的殘殺。觸目驚心的統計數據也強有力地支持這一觀點——在這場戰爭中，一共有75萬人犧牲，250萬人受傷，其中不少人留下了永久性的殘疾。雖然事實如此殘酷，但當時很少有人意識到這一點。西線總指揮約翰·弗倫奇爵士(Sir John French)於1915年底被調離後，其職務由黑格接替。這位沉默而嚴厲的蘇格蘭人勇敢而正直，因此逐漸在民眾中樹立起很高的聲望。這一聲望只有埃德溫·勒琴斯爵士(Sir Edwin Lutyens)在蒂耶普瓦爾為紀念英軍陣亡將士而修建的高大紀念碑能夠比擬。陸海軍的其他將領，如比提(Beatty)海軍上將以及艾倫比(Allenby)將軍(1917-1918年在埃及指揮英軍由巴勒斯坦攻入敘利亞，掃除了德軍的重要同盟土耳其軍隊的威脅)，也成為備受歡迎的戰爭英雄。戰壕象徵着一種嚴酷但不可避免的解決方法。布魯斯·班斯法瑟(Bruce Bairnsfather)筆下著名的漫畫人物「老比爾」，鼓勵他的戰友，如果他知道哪兒有「更好的活兒」就不會來當兵了，這幽默地表達了人們對塹壕戰恐怖氣氛的容忍。軍事危機度過後，英法得到來自美國的巨大軍事和經濟援助。英法聯軍終於在1918年11月11日停戰前突破了德軍防線並逼近德國邊境，而大眾的擁戰熱情也達到了頂峰。英國似乎面臨

着一種軍事崇拜的危險，而這種情緒是自從安妮女王 (Queen Anne) 統治時期的莫爾伯勒時代之後在英倫三島上從未有過的。

全面戰爭

戰爭之所以廣受歡迎——或者其後的不得人心——是因為全面戰爭牽涉到了全體民眾以及所有的社會經濟資源。在輕鬆地開始之後，戰爭在1915–1916年期間給工業和社會領域帶來了大規模的變化。它使得國家權力高度集中，集體控制權空前膨脹。工農業的生產力及其分配都被用來滿足強大戰爭機器的需要。1915年5月新建立的軍火部開創了新的模式，由勞合·喬治親自掌控。設立此部的目的是為了解決軍火供應中諸多瓶頸問題。通過「雷厲風行的工作人員」，該部成為整合整個工業結構為戰爭機器服務的發動機。它對其他領域，例如社會福利、住房政策，以及婦女地位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煤礦、鐵路、商業以及船運均被置於國家的控制之下。戰前舊的自由經濟模式，包括被視為神聖的自由貿易原則，都被繞過或者架空了。同樣，勞資關係的傳統體系也以全新的形式出現。1915年3月由政府與工會（不包括煤礦工會）達成的《財政協議》禁止罷工，但保證工會的集體談判權並間接給予工會領袖全新的參與政府決策的權利。

《財政協議》並沒有達到實現戰爭期間勞資關係全面和平的目的。煤礦業出現了很大的糾紛，引人注目的是1915年7月南威爾士礦工聯盟成功的正式罷工。軍火部試圖讓非熟練工人(主要是婦女)進入工程類工廠以「稀釋」勞動力並試圖控制軍工企業工人流動，這招致了很大的麻煩，特別是在克萊德賽德的工廠。1916–1917年期間，蘇格蘭和設菲爾德工人代表的非官方活動提醒我們，戰爭年代的共識非常脆弱，遠遠不是毫無異議的一致。然而，戰爭的確確保了工會以及工廠主們的集體地位，後者因新成立的英國工業聯合會而聯合起來。一種新的、有組織的、有計劃的產業關係體系似乎成為可能。具有重大意義的是，商界鉅子如艾瑞克·蓋德斯爵士(Sir Eric Geddes)、約瑟夫·麥克雷爵士(Sir Joseph Maclay)、德文波特勳爵(Lord Devonport)以及榮達勳爵(Lord Rhondda)等人都在中央政府關鍵部門擔任職務。這象徵着工業與政治領導階層的關係正在發生轉型。愛德華七世(Edward VII)的自由主義英國正逐步變成公司式的國家，差不多就像下一代人形容的「大不列顛有限公司」。

社會改革

在社會和文化活動的廣泛領域，大戰的整體衝擊是非常巨大的。左翼反戰者，如工黨的拉姆賽·麥克

唐納(Ramsay MacDonald)，極具諷刺性地指出戰爭的需要所帶來的社會改革遠遠大於過去半個世紀工會和進步人道主義者的所有運動所帶來的變革效果。政府的新遠景正在展開。新的元素正在注入和平時期統治英國的技術型、職業化公務員精英階層。行政和經理階層得到大規模擴張。像威廉·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或希波姆·隆特里(Seebohm Rowntree)這樣的社會改革家，甚至比阿特麗斯·韋布(Beatrice Webb)那樣的社會主義者都成為具有影響力的人物，受到中央政府部門的尊重，尤其是1916年12月勞合·喬治接替阿斯奎斯擔任首相之後。工資提高了，工作條件改善了。1917年的《玉米生產法》復興了英國的農業，給佃農和他們僱用的工人帶來了新的生機。技術性以及其他形式的教育也得到了重視。特別是隨着1918年《費舍爾法案》的實施，免費的初等教育得到了普及，該法案還試圖為大眾創造從初等到中等甚至高等教育的機會階梯。政府的一系列調查，包括保守派索爾茲伯里勳爵(Lord Salisbury)牽頭進行的一項調查，為國家住房計劃開闢了新的遠景，而這一領域在1914年前幾乎被新自由主義完全忽視。主要的原則定了下來，即建立一種地方政府負責的補貼住房體系，為成千上萬的工人階級建設廉租房，並且拆除城市中心和老舊工業區的貧民窟。關注公共健康的呼聲也出現了。極具諷刺意味的是，這場造成大規模生命損失的

戰爭，促使國內對生命更加重視，主要表現為改善醫療環境、關注兒童和老人、重視哺乳期母親，以及像建立醫學研究學會那樣的醫療創新。到了1918年底，政府承諾建立新的衛生部來協調衛生服務和國民保險，並且接替地方政府委員會在這些方面的職責。

婦女

英國社會從戰時經歷中獲得的最重要成果就是解放。的確，對於他們(事實上是英國人口的大多數)來說，這是一個解放的時代。戰爭期間的英國婦女是最大的受益者。成千上萬的婦女在前線服務，主要是在戰地醫院。護士伊迪絲·卡維爾(Edith Cavell)的傑出事蹟在公眾中提高了婦女的聲望。她因在比利時協助英法戰俘從戰俘營中逃走而被德國人殺害。在國內，女權運動領袖埃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及其長女克麗絲特布爾(Christabel，而不是她那個社會主義者的次女西爾維婭[Sylvia])積極協助政府的徵兵運動。婦女在較廣泛的領域得到了大量新機會，如事務性和行政性的工作、軍火生產和其他工程工廠的工作以及許多以前為男性所獨佔的眾多陌生職業。全面戰爭所造成的大融合對消除過去幾十年來限制婦女的性別障礙產生了巨大的壓力。那些認為婦女沒有能力完全行使自己的公民權利的論調已站不住

腳。因此，1918年的《人民代表法》賦予30歲以上的婦女投票權。這幾乎是反高潮的，因為婦女遭受迫害和偏見的長期苦難史如此輕易地就結束了。如同在別的領域，政府強調的是戰爭的正面和進步的影響，並且為公眾描繪出戰後和平時期大規模「重建」（重建的定義在這兒是扭曲的）的宏偉藍圖。也許並非有意，但政府設法擴展和鞏固當時的那種共識。

政治

戰爭給英國的政治造成了巨大而混亂的變化。戰爭爆發時，下議院仍由自由黨和保守黨（或者統一黨¹）之間那種滑稽可笑的競爭所主導。然而對於自由黨來說，戰爭給它帶來的是災難。一部分原因是戰爭造成的對個人與公民自由權利的侵蝕，另一部分原因則是許多自由黨成員對戰爭本身的價值所抱的模稜兩可的態度。1915年5月阿斯奎斯的自由黨政府變成三黨聯合政府標誌着自由黨的進一步衰落。此後，黨內就徵兵問題產生的嚴重分歧與阿斯奎斯毫無生氣的笨拙領導風格一直形影相隨。作為「血戰到底」承諾的象徵，勞合·喬治和丘吉爾都主張強制徵兵。

其他的老派自由黨員，如約翰·西蒙(John Simon)和雷金納德·麥克納(Reginald McKenna)，則猶豫不

1 英國政黨之一，主張愛爾蘭與英國的統一。——譯注，下同

決。阿斯奎斯本人也很躊躇。最後的決定是對18歲到45歲的男性強制徵兵，但這使得對阿斯奎斯以及自由黨的道德的批評聲音繼續增加。

危機終於在1916年12月來臨。數月以來公眾一直在抱怨政府的失敗，不僅僅是在戰場上，而且還表現在處理國內愛爾蘭問題和勞資糾紛時的無力表現。1916年12月1日至9日出現了錯綜複雜的政治變動。關於這個問題的真相，歷史學家們一直像中世紀的學者們那樣爭論不休。勞合·喬治與兩位統一黨領袖博納·勞(Bonar Law)和愛爾蘭人愛德華·卡森爵士(Sir Edward Carson)一起向阿斯奎斯建議成立一個最高戰時委員會來指揮作戰。幾天的猶豫不決之後，阿斯奎斯拒絕了這一建議。勞合·喬治隨後辭職。經過12月4日至9日的不同政治力量的關鍵性較量，勞合·喬治成為一個所有黨派都參與的聯合政府的首相。除在下議院佔有約半數的自由黨人之外，聯合政府不僅包括了所有的統一黨人，還包括在全國行政部門佔有微弱多數的工黨。此後，從1916年12月到1918年11月，勞合·喬治的權力達到了無人匹敵的接近總統的程度。他擔任最高戰時內閣的首相，由一個新的內閣辦公室以及私人秘書組成的「花園郊區」或稱廚房內閣作為後援。在這個頂峰的下面是一台巨大的集權機器。勞合·喬治的勝利有助於贏得這場戰爭，但對於他所在的自由黨而言則意味着災難。自由黨一直處於分裂狀



圖2 1916年9月，勞合·喬治在索姆河畔弗里考特附近與印度士兵交談。作為戰爭大臣(1916年7-12月)和首相(1916年12月之後)，勞合·喬治以到法國前線慰勞士兵的方式樹立起自己的領導風格。

態，基層組織遭到削弱，在議會裏沒有效率且四分五裂，而且在媒體與知識分子圈子裏顯得缺乏道德與激情。新自由主義在1914年之前發起過如此多的社會改革，現在卻偃旗息鼓了。當戰爭在1918年11月結束時，自由黨變成了四分五裂並遭到極大削弱的殘餘小黨，成為全面戰爭的最大受害者。

出人意料的是，自由黨的地位被工黨取代。工黨也曾因這場戰爭的爆發而分裂。與工會領袖們的愛國主義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麥克唐納和許多左翼社會主

義者反對參戰。麥克唐納不得不因此辭去了議會工黨領袖的職務。由於戰爭期間對一些問題的爭議，如強制徵兵的影響(軍事上，可能還有工業上)、是否參加勞合·喬治的聯合政府的決定等問題也困擾着該黨。然而，從長遠來看，戰爭對該黨來說是有利的。工黨所依賴的工會組織由於戰爭而加強了。到1919年初，工會會員增加了大約一倍，達到了800多萬。工黨還受到俄國革命以及戰爭最後兩年廣泛的反戰激進主義的鼓舞和影響。事實上，工黨既參與政府，同時又扮演着正式反對黨的角色。這是個理想的位置，可以利用自由黨的內部困難。最後，1918年的選舉權改革使投票人從大約800萬人擴大到超過2,100萬人。這就意味着工人階級選民的劇增以及以階級為基礎的政治兩極化趨勢得到鼓勵。1918年的工黨章程賦予該黨對社會主義全新的承諾。更重要的是，工黨對選區組織和黨總部的結構進行了重組，自始至終都由工會主導。工黨的快速發展是戰爭所造成的強大政治後果，但在當時卻沒有人預料到。

真正的受益者是保守黨。戰爭的進程使該黨成為自然的多數黨。自詡為愛國者的保守黨被戰爭團結起來。此外，在1914年之前因關稅和其他問題鬧過內訌之後，保守黨日益被商業與製造業利益所主導。保守黨人的選民基礎現在主要是在城市和近郊，而不是鄉村。戰爭結束時，隨着像斯坦利·鮑德溫(Stanley

Baldwin)和內維爾·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這樣的重商新人物的出現，保守黨和工黨一樣擺好了毀掉愛德華時期建立起來的政治體系的架勢。1918年11月11日戰爭結束時，勞合·喬治取得了對國家的完全控制。他在政黨聯盟中的自由黨人殘餘力量與保守黨結盟，對抗反政府的自由黨「反戰主義者」以及工黨中的「布爾什維克」。右派主導的新時代正在來臨。

大英帝國

在國外，戰爭歲月促進了更多的變化。無論從何種意義上來講，這都是一場帝國戰爭，為大英帝國與英王和國家而戰。英國從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南非和印度得到很多軍事和其他方面的協助。澳新軍團日(紀念加利波利半島蘇弗拉灣的戰役)成為澳大利亞日曆上悲情的、象徵性的事件。1917年，勞合·喬治實際上召集過一次大英帝國諸國首腦參加的帝國戰時內閣會議，討論協助宗主國內閣的事宜。像南非的揚·史末資(Jan Smuts)²將軍那樣有權勢的帝國政治家甚至曾被請來參與英國的內閣討論。在商業上，帝國特惠制正成為現實。在這個時期，大英帝國

2 揚·史末資(1870–1950)，又譯斯穆茨，南非政治家、軍人和政府總理(1919–1924，1939–1948)，國際聯盟與聯合國的創始人之一，曾積極促成南非加入英聯邦和其他國際組織。